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 和它的西傳

卡 特 著

商 务 印 書 館

中國印刷術的發明 和它的西傳

卡特 著
吳澤炎 譯

商務印書館

本書系根据美国哥倫比亞大学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年出版的卡特 (T. F. Carter) 著“中国印刷术的發明和它的西傳”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一書譯出。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国、朝鮮、日本、阿剌伯文的材料, 对于印刷术(包括造紙)的發明和向世界各地的傳播情况, 作了簡明而全面的敘述, 并提出了無可爭辯的結論: 中国首先發明了造紙和印刷, 并对欧洲造紙和印刷事業的开始, 都起了决定性影响。本書迄今为止仍是外人論中国印刷的最全面的一本書, 对研究这一問題和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讀者, 都有参考价值。

中国印刷术的發明和它西傳

卡特著 吳澤炎譯

商 务 印 書 館 出 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二五号)

新 华 書 店 总 經 售

京 华 印 書 局 印 刷

統一書号 11017·22

1957 年 12 月初版

開本 850×1168¹/₃₂

1957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162,000

印張 6⁸/₁₆ 插頁 21

印數 0001—2,600

定價 (7) ¥ 1.30

目 录

譯者前記	5
------------	---

序論	9
----------	---

第一編 中国印刷术的背景

第一章 造紙的發明	17
第二章 印章的使用	22
第三章 石碑榻本	29
第四章 佛教的發展——促成印刷需要的推动力	33

第二編 中国的雕版印刷

第五章 雕版印刷在中国的重要性。墨和雕版印刷的方法	36
第六章 中国佛寺中雕版印刷的开始	41
第七章 日本称德天皇和她的刻印百万經咒公元 770 年	47
第八章 最早的雕版書——咸通九年金剛經	53
第九章 馮道刻印九經 932—953 年	61
第十章 中国雕版印刷的高潮——宋元时代	70
第十一章 紙幣的印行	86

第三編 雕版印刷西傳的进程

第十二章 通过大絲路的初期的思想傳播和商貨販运	99
第十三章 紙張由中国傳至欧洲的千年長程	110
第十四章 吐魯番境內回紇人的印刷事業	118
第十五章 印刷和阿剌伯人	128
第十六章 元帝国内中国和欧洲的接触	132
第十七章 东方和西方的交通大道——波斯	144
第十八章 十字軍时期埃及的雕版印刷	152
第十九章 印刷西傳中紙牌的作用	158
第二十章 織物的印刷	166
第二一章 欧洲的雕版印刷	173

第四編 活字印刷

第二章	中国活字印刷的發明·····	182
第三章	朝鮮国内活字印刷的重要發展·····	190
第四章	谷騰堡發明的世系·····	201

譯者前記

十七世紀以來，對於蔚為大國的漢學研究，曾有一定的成就。其中日本因為和大陸只有一水之隔，文字比較接近，尤其是由於遠自隋唐以來就大量接受了中國文化，所以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範圍最廣，量也最多。清末黃遵憲日本國志中說日人單是說經之書，就有四百多種。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研究的成績，法國人卡迪 (Henri Cardier) 曾輯有中國圖書志 (Bibliortheoa Sinica) 一書。從中國重要典籍的先後被譯成外文，其中包括五經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老子莊子本草綱目格致鏡原等等；有些書的譯本還不止有一種，例如五經的譯本至少有三種以上，道德經的譯本至少有四種以上，也可以想見外人研究的梗概。至於因國外方面關於流沙墜簡、敦煌古卷的研究，對中國古史研究所起的推陳出新的影響，那都是最近幾十年中的事，記憶尚新，毋待贅述。

當然這些漢學家的品類是很不齊的，他們有各色各樣的動機，從直接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服務、獵奇好異的心理，乃至作純粹科學的研究，應有盡有。其中挂了學者的招牌，對我國的文化遺物，連騙帶搶，巧取豪奪，以達名利雙收的目的的，像斯坦因之流，也不在少數。在所謂漢學家，本書著者卡特 (Thmo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 屬於比較正派中的一位，他的研究中國文化，基本上是為了求知，根據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在他的著作里議論還算持平。

卡特是祖籍蘇格蘭人的美國人。他於光緒三十二年 (1906年)

到中國觀光，在安徽懷遠三個月的短期停留中，曾請人教授漢文。回國以後，繼續自修，掌握了漢文，專門致力於中國印刷木的研究。1924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化系系主任，但翌年就因病去世。本書是1925年他去世以前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出版的，1931年又重印一次，但內容沒有改動。聽說去年又有新的修訂本出版，由柔克義（Rockhill）增補了一些新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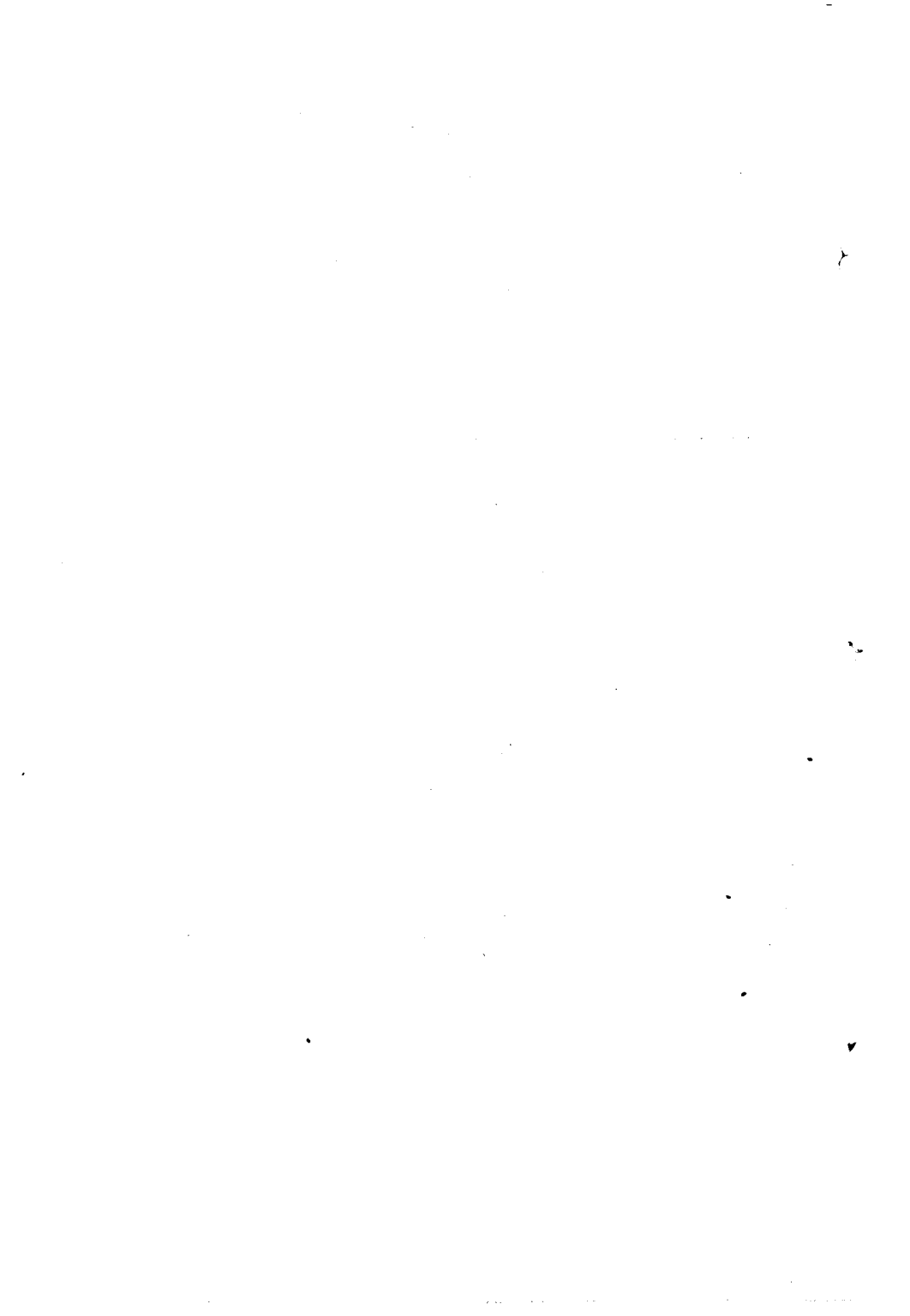
印刷木是中國的三大發明之一。但過去我國在這一方面的全面性的著作似乎不多。叶德輝的書林清話，主要是版本學的研究；孫毓修的中國雕版源流考為材料的輯集，著者沒有加系統的論斷。把中國的印刷作全面的研究，從發明的背景、發明的演變、以至它的西傳，本書可以說是第一本。當然，由一位外國人來研究這麼一個複雜的主題，尤其是擔任筆路藍縷的開創工作，勢所必至一定會有許多破綻缺點的。尤其從出書以後到現在幾十年中，新的材料續有發現，在個別專題的研究上近人的研究已有青出于藍、突過他的地方；在論證方面也陸續有新的補充（例如關於紙的外傳，可以參考1954年歷史研究第四期季羨林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關於朝鮮的活字印刷，見1957年歷史研究第三期張秀民朝鮮的古印刷）。但就全體而論，本書的優點还是很顯然的。尤其外人研究漢籍，關於中外交通史部分，誠如馮承鈞在他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譯序中所說的：“蓋彼方有多數之德法英俄比荷意匈等國學者研究之成績互相參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語言專家以相輔助”，這些便利的條件在我們一時還不容易完全具備。所以本書無論作為已有的文獻，或對今後作繼續進一步的研究，都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本書曾由劉麟生先生翻譯，列入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名著

中，題名中国印刷源流史。但譯文是文言文，內容頗有節刪；作為原書特点之一的注文，譯本也沒有完全譯出。因此就決定重譯。譯文的第十五章對原書作了兩三處字句的改動，此外注明譯注的地方，都是譯者所加的。譯文曾經馬清槐同志通讀，作了一些改正。

商务印書館在中国的印刷史上曾起過一定的作用，即以本書的重譯出版為書館六十周年賀。

譯者 1957 年 5 月 1 日



序 論

歐洲文藝復興初期四種偉大發明的傳入流播，對現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紙和印刷術，替宗教改革開了先路，並使推廣民眾教育成為可能。火藥的發明，剷除了封建制度，創立了國民軍制。指南針的發明，導致發現美洲，因而使全世界、而不再是歐洲成為歷史的舞台。這四種以及其他的發明，中國人都居重要的地位。本書以印刷術的發明為限，專門研究這一發明的事實真相。

西曆紀元後最初幾世紀內，中亞的游牧部落，侵入中國，造成了几百年的混亂局面（譯者按：指五胡十六國時期），相當於歐洲的黑暗時期。不過這種異族的流動，在遠東方面不像在西方那樣，把古來的文明連根摧毀，所以中國不久便能恢復元氣，具備創造各種發明的條件。這些發明，在文藝復興初期先後傳播到基督教國家。馬哥孛羅的記載告訴我們，中國在十三世紀（宋元時代），文明已經光明燦爛，比起同時的歐洲，要進步得多了。

歐洲正要進入新的生活時，發現了就近的阿剌伯帝國和君士坦丁（東羅馬帝國）的文化淵源，就像飢人得食，趨之若渴。在這種文化淵源里，不單藏有他們自己的古代希臘羅馬的舊學，還包括一種新的因素、一種發明和實地發現的基本上現代化的精神。這種精神也和舊學一起由東方傳入了歐洲。此時把這些發明傳入歐洲的媒介，為阿剌伯人和蒙古帝國的人。他們不是發明者；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許多的新步驟新方法，都是在中國逐漸孕育發

展出來的。新的發明，加上了死灰復燃的希臘羅馬文明，對於促使歐洲走向進步之路，起了很大的影響。如果單靠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是絕不可能促成這樣的進步的。消沉了千余年的歐洲人，能夠急起直追掌握這些發明，並且利用它們作為建立新文明的基礎，這是他們的光榮。

中國的發明物中，以影響於歐亞文化的程度而言，當以造紙和印刷術最著名。關於造紙的發明，早為一般學者所注意。多年來擔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講座的夏德博士 (Dr Friedrich Hirth)，首先對這個問題進行科學的研究，其後威爾斯 (H. G. Wells) 又在他所著世界史綱中作了通俗性的敘述。反之，歐洲的學者，對於中國發明印刷術的事實，除了一些極粗的輪廓以外，幾乎全無所知。第十一版的大英百科全書論活字印刷術的文章中，對歐洲方面谷騰堡 (Gutenberg) 和科斯特 (Coster) 兩人誰先發明活字體的爭執，占有十七頁之多；而對於歐洲發明印刷術以前的全部知識，只占有半直欄的地位。德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書書目中，論印刷史的部分有對開本兩巨冊，但涉及中國者，只有一篇 1847 年巴黎出版的雜誌論文。

但是任何歷史研究的著作，都不能說完全是新的創作。本書研究中國的印刷術，可說是幾百年來中、日、西方學者們研究所得的撮要，並參証了最近新疆和埃及發掘報告的結果。本書的主要材料來源，可見書後參考書目，著者對前人研究的結果，曾廣為援引，這是著者所十分感激的。另一方面，把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域的材料，加以綜合參証，大體上還是一片新開的境界。正因如此，才使本書的寫作，一方面感到困難，一方面也深為感奮。

1550 年意大利歷史學家約維斯 (Jovius)，研究了葡萄牙旅行

家从广州携回献呈国王、由国王贈送教皇的几本中国雕板書，断言欧洲的印刷术，淵源来自中国。欧洲文献中提到中国發明印刷术，显然以此为最早^①。到十八世紀，喀勃賴 (Phil Couplet) 在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專文中，以公元 930 年(按为后唐明宗長兴元年)为中国發明印刷术的一年，他的結論，显然是以天主教教士的报告为根据的。1765 年米尔曼 (Gerard Meerman) 在所著活字印刷术的起源 (Origines Typographical) 書中，根据阿剌伯人的載籍，叙述了初期中国印刷的情形^②。

此后，根据中国方面材料而研究的，有克拉普罗斯 (J. Klaproth, 1834 年) 和汝理昂 (Stanislas Julien, 1847 年)^③。汝理昂將研究的結果，写成一篇短文，在亞洲杂志 (Journal Asiatique) 發表。这篇文章内容虽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实际上却成了迄今为止西方对这一問題的論著的藍本。1858 年寇仁助爵 (Robert Curzon) 在倫敦愛書會會報 (Miscellanies of Philobiblon Society of London) 發表的論文中，附有迈多斯 (T. T. Meadows) 給爱尔琴助爵 (Lord Elgin) 的一封信^④；这封信是用欧洲文字發表，迄今为止叙述中国雕版术最好的作品。但是由于刊物的無名，而論文的全文价值不大，使这封信不幸湮沒無聞，显然沒有受到后来著述家的注意^④。自 1858 年以后，欧洲各国文字中关于中国印刷术的可以信賴的著述，可說絕無仅有，直至 1923 年，才由柏林的霍勒博士 (Hülle)，一部分根据汝理昂和薩陀 (E. Satow) 的研究，一部分直接取材中国的典籍，印行了一本十五頁的小册子，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历史和印刷术在朝鮮的傳播，作了明白的綜述。霍勒主持柏林国家圖書館中文部，著者深幸曾在他專家指导之下工作过几个月，并承他把所有的全部資料，供著者利用。

1882年薩陀在日本亞洲學會叢刊(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發表了一篇文章，敘述朝鮮日本印刷的歷史^③，至今仍為西方關於這一題材的主要資料。

近代中日兩國的學者至少曾有三種著作^④，收集了本國關於印刷史的主要歷史事實。日人所著的書，自然講中國的材料較略，對朝鮮的材料和日本印刷術的發展說得詳些。不幸這三種著作都只有中日兩國文字的本子，據著者見聞所及，在歐洲人的著述中都沒有提到過它們。這三種著作篇幅都不大，但比上述用歐洲語文撰寫的短文，要完備得多了。

本書編寫時，曾廣為參考上列五種文字(中日英法德)寫作的論文和專著，包括它們所介紹的實際材料，尤其是它們對於古代中國文獻的記載。

另外的重要的取材來源，為中國的各種大類書，特別是雍正四年(1726年)印行的圖書集成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印行的格致鏡原^⑤。這些類書的可貴，大部分也由於它們引載了古籍的記述。由於書寫的進步，如毛筆和造紙的發明，促使中國的著述家紛紛從事於博古的研究，產生了大量的著作，但不幸對於印刷一道，都視為當然，很少提到。書法被視為藝術品，而印刷只是一種手藝的東西。不過根據所有這類直接的文獻，再補充許多間接的記載，我們對於印刷術的初期歷史，也可以有一個相當明白的圖景；至少和我們所有的關於同在暗昧之中發展起來的歐洲活字印刷的初期歷史的知識，可以伯仲。自然，在今後的研究中，從浩瀚的中國文獻中，很可能發掘出許多前所未見的重要材料。

材料的另一來源是考古學，它們給我們最確實的資料。新疆省的沙漠空氣，也同埃及一樣，完整地保存着古代文明的遺物。根

据各国学者的研究和發掘，我們已經可以追想紀元初一千年中中国西部边地的历史和日常生活。这种研究的結果之一，証明了这一时期內中国書籍記載的正确性；另一結果，和本書的題材有更直接的关系，便是在新疆各地及其附近，發現了大量的时代不一的雕版書籍，对中国印刷术的进步及其向西傳播，頗能有所闡明。埃及發掘所得的遺物中，也揭露了从前沒有意想得到的活字印刷活动的产物，这种活动一直持續到十字軍結束时才止。这一發掘的重要性，在目前仍是一个未解之謎，但最后可能会引导我們进而發現远东和欧洲活字印刷术兩者間的关联。著者曾从書籍中，从保存于各博物館的遺物中，特别是从与考古学家本人的談話中，考証这些考古上的發現，成为研究中最有兴味的部分。本書即是根据这种的研究写成的。

問題各方面的其他資料来源，已見于参考書目，因材料繁多，所以采用分章刊列的方式。

前面已經說過，著者除参考了書籍以外，也得到个人的助力，必須在此表明我的感激之忱。在編写本書时，曾得到世界研究中国、中亞、阿剌伯史的若干权威学者的教誨、指导和批評，并得到他們的友誼，这是使著者感到最深切愉快的。在柏林和維也納，在南京、巴黎和倫敦，都取得不倦的照顧和合作。

在柏林研究吐魯番的一些發現時，勒考 (Le Coq) 博士曾天天予以專業的指導。在維也納研究埃及的雕版書時，捷克斯洛伐克的格罗曼博士 (A. Grohmann) 曾予以鼓勵。考訂倫敦博物館所藏敦煌故物時，得到华来 (A. Waley) 和瞿尔斯 (Lionel Giles) 的帮助。霍勒博士十分丰富的藏書，給予研究工作不少便利。哥倫比亞大学的同事，中国系的波特教授 (L. C. Porter)、印度伊朗系

的杰克孙教授(A. V. W. Jackson)、塞族系的高特赫教授(R. J. H. Gottheil)和古代史系的威斯特曼(W. L. Westermann),都曾閱讀本書的原稿,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以上都是著者所深為感激、愧無以報的。

但作者負感最深的,當推法蘭西學院的伯希和教授(Paul Pelliot)。他在研究中國文化中,樹立了正確和深入的新標準,為後來研究者所銘感無已;他對於文獻和遺物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本書的許多結論,就是建立在這些材料之上的。但著者感激他的地方,還不限于此。他曾經細心逐章讀過著者的初稿,逐漸引導著者在研究中國文化中採取更明白正確的方法,對稿件的每一頁,幾乎都提出了意見和修正,經著者推敲以後接受,並廣泛地表示他的歷史理解的豐富知識。

像本書這樣的著作,要對所有惠予協助的人,一一列舉,表示謝忱,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除了上文已經提到過的各位外,對於下面的各位,曾費去他們的時間和得到他們專家知識的指導,必須在此一提,表示銘感:列寧格勒大學中國哲學教授阿力克謝也夫博士(Dr. Vasseely Alexeiev),英國博物院東方藝術部主任賓陽(Laurence Binyon)、劍橋大學阿剌伯文教授布朗(Edward G. Browne)、巴黎現代語學校中國史教授科提埃(Henri Cordier)、中國迷信研究(Superstitions en Chine)著者多蕾(Henri Dori)、柏林大學中國文教授海尼許博士(Dr. Erich Hähnisch)、瑞典中亞探險團團長斯文赫定博士(Dr. Sven Hedin)、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海夫特(John Heftner)、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教授夏德博士、北京大學中國史教授許地山、高麗史著者赫爾伯(H. B. Hulbert)、東南大學圖書館館長洪有丰、朝鮮漢城美國長老會牧師刻爾(William C. Kerr)、

挪威 克里斯当尼亞大學梵文教授科諾夫博士(Dr. Sten Konow)、芝加哥博物館人類學部主任洛弗博士(Dr. Berthold Laufer)、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代理主任李小綠先生、牛津大學阿剌伯文教授馬哥立斯博士(Dr. David. S. Margoliouth)、柏林東方語言學會阿剌伯文教授穆里茨博士(Dr. Bernhard Moritz)、柏林人類學博物館中梵文主任穆勒博士(Dr. F. M. K. Müller)、紐約大學藝術系主任李甫斯泰爾(Rudolf M. Riefstahl)、柏林東方語言學會日本語教授沙西密博士(Dr. Clementz Scharzhmidt)、維也納國家圖書館阿剌伯古紙保管主任舍夫博士(Dr. Theodor Seif)、維也納國家圖書館歐洲雕版書保管主任斯狄克士博士(Dr. Adolf Stix)、美國農業部圖書委員會主席斯溫格爾博士(Dr. Walter T. Swingle)、紐約自然博物館人類學部主任維斯勒博士(Dr. Clarke Wissler)。

對供給本書圖片的各方面，也應該在此表示謝忱。書內所印照片，大部分就博物館中所藏原物攝出。在取得倫敦博物院和柏林人類學博物館中的照片時，曾承華來先生和勒考博士盛意協助，著者特別對他們表示感激。取自他書的圖片，都已在該圖的下方注明，至於原書的全名，出版的日期地點，可見書末的參考書目。

漢字的羅馬拼音，都用霍爾斯的方法。這種方法雖有其嚴重的缺點，但似乎是學術界最通行的方法。不過對於中國的省名和像北京一類大城市名，則另外採用中國郵政局的拼音。

中國的作者戴侗在十三世紀中曾著有六書故一書^①在其叙例中有下面的一段話。本書的旨趣，沒有比這段話表顯得更好了。

予之遲遲于卒書者，非不敏不勤，蓋有待也。雖然，年運而往，來日几何？欲有待，則書之成，未有日也。故予姑約其三年之功以為書。孔子曰：“裨諲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予書，草創之書也。議論是正，則以俟君子焉。……吾書非一家之言也，不吾鄙者，細

愆糾繆，匡其不及，而補其闕，以成不刊之典，竊有望于后之君子焉。

注 釋

① 所引約維斯的全文，見第十六章注九。

② 米尔曼的根据，是“1317年阿勃特拉（Abdalla）用波斯文所写的中国史（Historia Sinensis），書內說印刷是一种通行的技术”。他引的这句话，也許出于巴那卡底（Banakāti）之作，拉斯特·哀丁（Rashid-eddin）曾引証巴氏的書。見第十七章注十九。这些以及其他欧洲早期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記載，可見托馬斯著美国印刷史（Isaiah Thomas: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America 1810年）第72頁。

③ 見参考書目。

④ 台維斯（J. F. Davis）在所著中国（China）一書中，对中国印刷术的發明，曾有簡短而正确的叙述（1857年版、第二卷第173—174頁）。我相信这一段文字，也見于本書1836年的旧版中。

⑤ 叶德輝書林清話；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朝倉龟三日本古刻書史。

⑥ 为科学的正确性起見，自然最好把类書或其他資料書中所引証的每一句話，都能找到最早的出处。但因本書範圍之广，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过对于書內历史綱要所依据的重要篇章，我曾努力寻求最初的出处，并比較了版本的异同。另外在引用間接材料的地方，或少数引用欧洲学者譯文的地方，曾对間接材料和原始材料加以說明。所应注意的，中国类書或其他資料書在引用古籍时，几乎全引原文，而不是改写或摘要。这种方法，除了抄写时的可能錯誤外，大大的减少了轉述的錯誤。

⑦ 載侗六書故，霍伯京譯（L. C. Hopkins 1881年廈門出版，第60—61頁）。